



黄土文明与地方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的介休范例

●徐新建 彭兆荣 周大鸣 安介生 王怀民

摘要:黄土文明与地方发展是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团队针对黄土文明的人类学研究开展的系列议题之一。议题以山西介休的实践为例,关注文化遗产的地方保护经验,围绕遗产保护的现实背景、地方规划的权力均衡以及政府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功能等方面展开阐述,架起了学者与政府领导沟通的桥梁,为介休的文化发展建设从“文化遗产保护”阶段进入“建设城市之美”阶段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和理念探索。

关键词:黄土文明;文化遗产;介休;人类学

文章编号:1003-2568(2015)05-0112-07

中图分类号:K901;G1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邮编:610064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邮编:361005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邮编:510275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邮编:200433

王怀民,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政府市长。 邮编:032000

DOI:10.16564/j.cnki.1003-2568.2015.05.043

[主持人语]徐新建:2015年5月1日,人类学高级论坛“黄土文明介休案例”课题组成员围绕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文化遗产保护的介休范例”在四川大学进行了专题对话,由我和彭兆荣、周大鸣、安介生三位教授代表自己的课题团队,就山西介休在近年来推进的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实践做出评价并提出问题,然后由王怀民市长做一些回应。

一、起于不忍,施于敬畏

徐新建:我对介休遗产保护的历程做了梳理。我认为王市长主要是担当了介休历史文化名城复兴的重任,然后他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第五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这一前一后,一个是担当重任,一个是得到评价。对于这一过程我总结为五条值得讨论的特点,即起于不忍、行于觉悟、施于敬畏、规于同情,最后是创于探求。

第一点,我把介休的遗产保护归纳为“起因于不忍”。这个“不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内在缘由,就是面对着作为文物大市的介休,在遗产这方面一度呈现的景象是一地碎片,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在新时期遭遇千年文化断层的一个现状。文化遗产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断裂,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断裂使传统文物基本上都没有

了,当中的很多细节就不在此展开了。面对这样的现状,各有各的看法,而我觉得王怀民市长的初衷源于不忍之心,就是我归结的起因于不忍,是一种内在而深沉的动力。

第二点,是“行动于觉悟”。我注意到关于介休遗产保护的很多材料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不保护就是破坏”。有些人面对遗产濒于消亡的现状,选择的是不闻不问,但是王怀民市长有一个自觉意识,提出不保护就是破坏,我觉得这就是行动于觉悟。

第三点,是“实施于敬畏”。我认为这是介休领导班子很重要的精神资源。敬畏什么?就是敬祖先、畏形势,就是尊敬传统、谨慎行动、如履薄冰地去做这个事情。敬和畏,说得很好,所以才有一个口号叫变“旧城改造”为“旧城保护”,不大拆大建,不轻易去破坏过去的东西,这便是我归纳的“实施于敬畏”。

第四点,是“规划于同情”。规划是一种权力,有时甚至成为特权,但怎么行使这个权力?这个同情就是心同此情,就是与传统同在,与百姓同情,就是把本地的建设和规划看成是公共的事情、长久的事情、大家的事情。由此来看,介休的当地部门提出的三句话口号值得关注,就是“保护遗产,改善民生,复兴文化”。在这当中,远景也有了,就是建设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大美介休,这个境界非常高。我觉得同情之心是

※ 录音整理:罗崇蓉、王浩,校对:唐蒋云露。

很重要的,因为中国的政治系统向来有一种回避制度,就是要用流官,废除土官,强调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要让外地人来做本地官。这个当然避免了裙带关系等,但是有一个很深厚的弊病,就是外地官不对本地负责。他5年就走了,看不见长远的功效,所以懒得关心长远。另外,如果他的施政行为对当地未来造成破坏,以后也不用担责。所以一个不在本地长期居住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同情心的。对于介休近年制定的规划我不敢说是全面,但能体现对本地百姓长久利益的同情就值得充分肯定了。因为只有规划于同情,才可能把底层的诉求吸纳进来,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软实力,继而把对长时段政绩的评估纳入本届政府的视野。如果我们横向比较,在目前中国的100个城市里面,可能只有10%至20%的城市做得到这样,因为政府不这样做也不会被批评,做了也不见得会被表扬,而且还有风险。所以我觉得介休的“规划于同情”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在听了王怀民市长的介绍后,我又加了一点,叫“创意于探求”。探求就是一方面要勇于探索,另一方面自己要求知。王怀民市长讲过的内容,让我发现其实他背后是有一个知识团队的,他的知识来源于虚心求教,我们可以从介休后面看到一个知识和政府的融合。

下面提几个问题,让我们来一同探讨。从大的格局来讲,我们讲整个中国,有“经济中国”“文化中国”等,“经济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全世界都瞩目的,那是硬指标,但是“文化中国”面临着一个重建的困境,在这个大格局下有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第一,怎样兼顾遗产保护中的有形与无形?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怎么打通古代和今天?王怀民市长的讲话也提到了,古代的建筑、遗址要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兼容,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难做好。根据我们在介休的调研,那些城隍庙的功能其实是传统性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的庙也在用,但却是在里面搞一个招商会,搞一些服装展览,那个叫兼容吗?很难说,因为一个庙的功能是有文化规定性的,这不仅是介休的问题,整个中国都面临着一个文化断裂,那么介休能不能走出自己的独创?值得追问和思考。

第三,文化建设怎样沟通乡村与城市?介休现在是按一个城市去打造、宣传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是一个城乡结合的文化空间,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广大的农村怎样被涵盖到介休的整体里面,而不只是那几条街,或只是城墙围着的那个小的空间。因为乡土中国的文化,它的根基、它的民俗肯定在乡

村,如果切断了乡土对城市的输送,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死的城市。什么是城市呢?城市应该是有院落、街坊、民俗以及历史积淀的文化生命体,包括小吃店这些,现在的新建城市没有肌理,那些高层建筑没有邻居,没有玩伴,那不叫城市,就是一个个楼盘。

还有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如何在遗产保护中使官与民相互关联,不仅要有官员代表政府行使社会公共权力,同时还要有渠道保障地方民众的参与权。我不知道介休的地方政府在制定规划的时候有没有征集民意,就是老百姓有没有知情权。大家的印象里面老百姓通常是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的,比如在一些城市,规划部门要修条路、建座楼,甚至挖一条河,直接就做了,做了你也只好就认了。做得好,市民得益;做得不好,也只有忍受。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当中,政府需要跟老百姓互动。在这点上,介休做得怎么样?市级政府是怎样取信于民的?有没有一些很好的案例?

在我的调研中,介休有两件事情让我感动,一个是拆迁,老百姓不愿意搬,王怀民市长亲自去做工作,让他们知道这个是对他们有益的。还有就是对一座古建筑的修复方案,有两种意见——抬高和降低。为了防水,很多人支持抬高,但有一个专家不同意,说那样就破坏了古建筑的原貌。最后经过论证,王市长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决定保持原高,用地下管道去解决防水的问题。可见,底层社会、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知识、愿望和诉求怎样进入政府决策,官民之间怎么打通,在介休是能够总结出相应经验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文物恢复以后,怎样把它变成一个长期持续下去的活态的传统?我觉得这个大问题也摆在了介休面前,换一个市长来,他不认这个,全部推翻又怎么办,那不就白做了?或许只给后人留下点零碎的历史记忆,像我们今天讲当年的阎锡山一样?对此,有没有可能考虑法制,做文化立法,使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做起来不光是让老百姓认可、媒体认可、学术认可,还要用法律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个规划是依法通过的,受法律保护,若想否定,必须走法的渠道,通过法律程序才能改变。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已有推进,遗产立法已在逐步实现中。介休可不可以走得更远一点?探索一下如何用法律形式保证本届政府的遗产保护成果得以传承?

二、文化规划,三位一体

彭兆荣:参加这样的对话特别感慨,这是我活到60岁以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父母官在我



们的几次会议当中都参加,并且从头到尾听讲。其实这是一个双赢和互相学习的机会,王怀民市长早上讲的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简单地讲几点吧。

第一,王怀民市长主政的主要是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我做遗产也做了好些年了,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一个是在上面的政府,一个是在底下的民众,在中间的就是知识精英。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以知识精英为主导,作为桥梁上连接政府,下连接民众。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遗产活动几乎都来自于法国,包括成都将要搞的“遗产节”“遗产日”,还有“名录”这些全来自于法国,他们是知识精英连接政府、促进立法的这样一种类型。第二种遗产保护类型是日本,他们是从底下、从民众发起的,民众督促知识精英和政府来做。第三种类型是中国的政府主导。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三种类型各有利弊,各有优缺点。那么中国的这种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是不可以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中国取得的各项成绩都来自于政府推动,当然,今天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来源于政府的主体和主导。政府的权力有问题,我还是认可王怀民市长讲的政府作为主体。徐新建讲的“人民做主体,政府做主导”听起来很漂亮,实际上是做不了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讲“家国”,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一定要有父母,也一定是听父母的。如果你要让民众出来做主导,或真正地做主体,那事实上是乱糟糟一团。不是说政府作为主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决定了家国制度、宗法制度,决定了父母官的这样一个传统,你突然间让民众去做主体,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人民做主体是一个漂亮的理想,至少在中国从过去到现在是一个乌托邦,所以我们不管是做主体还是做主导,一定是政府来做的。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要有好官的问题,自古以来都讲这个,清廉之官、好官。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是“人民信托”,就是人民作为主人信托给父母官的这种关系,我把我的幸福托付给父母官,你来代我做这个事情。“信托”虽然是一个新词,但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出现好官就有一代很好的天下和成绩,不好的官成绩就差,这是没有办法的。我现在在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体系的时候,也在努力用一种机制性的东西来克服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万一碰到坏官、腐败的政府怎么办?这个我称之为“负遗产”。这就是徐新建讲的断裂的问题。刚才我讲的遗产保护的第三种类型,中国一定是这种类型,而且就今天来看,它事实上还是蛮有成效的,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因为政府的问题造成

了文化遗产的浩劫,但是我们今天传统的复苏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文化遗产复苏和伟大复兴。所以这是两个事情,我们以后如何去改变机制,那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如果要讲得漂亮一些,就是人民的主体信托给好的政府、好的领导。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遗产不是今天我们提出来的,遗产运动是联合国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来的,在世界性、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遭到了灭顶之灾,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在这一情况下如何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质产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的背景下其实是一种制造价值,就是对抗经济一体化、标准化的价值制造,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制造一种价值。我们当然希望今天制造的这个价值可以持续地长久些,因为全球都是这样的。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再回到介休的例子去理解王怀民市长所做的事情,他已经超越了介休的个体、个案,他其实是在做一个难得的好父母官要做的事情。我不是在王怀民市长的面前去讲他的好话,因为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领导,不去追求 GDP,而是花 5 个亿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在中国当下的领导中间凤毛麟角的人去做的事情,到山西一看就会明白。所以介休的范例让我们学会把政府和人都带进去,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们去做城市建设,做遗产保护,没有政府和人在里头,这个事情是谁在做?我早上讲了,历史事件总是要有人来承担,所以王怀民市长在刚才讲了一句相当有意思的话,我要回应,就是“在山西没有煤炭的地方把故事讲成了历史,有煤炭的地方把历史讲成了故事”。那么介休,我要补一句,它是在故事中复原历史。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是说王怀民市长讲到的三个关键词,也就是徐新建总结的,政府文化规划的三位一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写过的文章中略有批评,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成绩来自于这个,现在的毛病也出自这个。因为政府,按费孝通的说法,它是横暴权力,它不跟你商量。政府加上资本、投资商,再加上规划,那是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的。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的城市也千面一孔,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你找不到规划院。所以我对规划院现在成为一种权力化的东西也表示某种质疑。特别是当它跟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行政权力、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三者结合的时候,老百姓成了最没办法说话的人,而且以后出了问题没有任何的责任承担者的。所以我们在把任何一个规

划作为重要话题的时候需要对规划院进行重新的认定。因为我也做过一些旅游规划,规划是在前面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才来做的。我们国家现在是立刻就进入规划了,很多时候是决策一下来就请规划院,那里头没有文化的积淀,没有文化的评估,没有文化资源的充分调查和相互配置。讲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我上个学期去云南民族大学讲学,何少英校长问我,你看新校区是不是似曾相识?我一看,那不是厦门大学的漳州分校吗?他说你说得对,清华大学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厦门大学漳州分校的模式直接搬过来去做云南民族大学,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他,现在云南民族大学这个新校区就成了厦门大学漳州分校直接的移植,这就叫技术权力。所以我认可王怀民市长讲的,我们国家以前确实是没有规划。徐新建讲了巴黎,巴黎城市的规划是在拿破仑时代做的,到今天下水道可以开油轮,我们中国现在时时刻刻在修马路,很多时候是下水道的问题,下水道不通了就要去改它,不断地在挖,这个其实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规划不做地下,因为底下不见政绩。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这些规划院不是看不到,但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可规划是一个城市最为重要的东西,但规划的技术权力要有所制约。

最后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乔老先生跟我讲“非遗”要活化的问题,你用什么方式来活化?我简单讲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式,比如介休的唱戏和戏台是人民非常喜欢的,介休的戏台也是全国最多的,能不能让退休人员直接参与到“非遗”的资料整理、拍摄、文字记录,让他们进入档案馆中去?其实很多退休的人都在跳街舞,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可以直接去参与保护的。因为是老一辈,他们的工作是可以直接把青年人带进去的。如果把退休人员,特别是有知识的进行分组,你拍摄我记录,他们不仅成了老一辈的代表,还直接融入了介休的各种文化类型中去。这些就是我想讲的,谢谢!

三、以俗建雅,保持特色

周大鸣:这次听到王怀民市长的报告,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能有这样一位为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建设如此努力的市长,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介休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因为在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市的扩展,它是一对矛盾。怎么样很好地解决它呢?王怀民市长用“碎片重构,新旧共融”这样一种模式,可以成为这一类

历史文化名城在迅速的都市化过程中成功探索的范例,我觉得意义在这里。所以应该要把这一套东西进行总结,这是每一个地方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有历史,只要有历史的地方,它在建设城市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相对来说在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很急于见成效,很急于把这些古迹推掉,建成一个新的东西。还有很多地方有了钱以后就开始把这些旧的不好看的東西给推掉,建假古董,建赝品。所以我觉得王怀民市长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既不去做赝品,也不去摧毁一个城市的记忆,在这点上做得很好。那么,接下来怎么做,我其实在几个城市论坛里面都做了一个报告,叫做“以俗建雅”。因为我们现在是千城一面,我们城市的特点和文化精神在哪里?其实我们就需要从这种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角度来重温我们一个城市的记忆,这是让我们每个城市都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仅要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还要做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里面很多的部分就是我们过去在乡土社会里面形成的一套民俗的东西。那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一个乡土社会向城市文明转型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把这一套民俗的东西在城市当中变成一种雅文化传承下来,这是给我们所有人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只有这样,文化遗产才能活化,才会有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想提出来的有关介休的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在介休跑了很多村落,每个村落里面都有大量的古建筑,而随着村落的凋敝和村落人口的迅速往外迁移,这些古建筑在迅速的毁坏之中。我们怎样来保护这一类东西,保护这整个城堡、城墙、古建筑?现在农村还有一些自认为有文化的人在做假古董,把这些门楼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象来建起来,建成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样下去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去借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模式,比如在云南丽江、大理的模式。就是把古建筑交给民间去做,因为政府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像介休每个村落都有大量的古建筑,就可以交给民间去做,给他多少年的使用权,可能介休走这条路子会是一个新的希望。因为我到黄山看到的也是,黄山下面每个村落里面的古建筑都很多,但都不是成片的,像黟县、宏村这种把文物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是很少。那么这种零碎的古建筑怎么样才能保存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提出的一个更艰难的任务。我自己觉得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很难做到,而政府主导、人民为主体还是一个从长远来讲的路子,至少我觉得对吸引全国的民间资本来进行文化遗产的保



护,把已有的有保存价值的东西保护起来,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像日本一样,把零散的建筑拆迁下来进行集中,因为它所在的地方你去保护又不能很好地保护起来,那么介休如果把各种各样零散的建筑集中起来建一个民俗村,可能这也是一种方式。因为你不去保护它,不去把那些建筑拆了,民间就把它卖掉,不知道卖到哪去。我想以这些多种方式把村落这一块做起来,对于全国也有示范性的作用。在日本的时候,我参观过一个明治时期的建筑村,它就是把散见在日本各地的明治时期的建筑集中保护起来,而且也是各个财团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把那些建筑进行重建、搬迁,是这样做的。我想介休也可以做一个试点,在全国吸引资金,也许可以成功。城市化的进程对村落这一级的破坏很快,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遇到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民俗也在消失之中,当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来体现介休的特色呢?这是我的感想,也是我提出的可以进一步往下走的一些思路吧。

四、认识山水环境 营造城市之美

安介生:我觉得有王怀民市长这样的父母官的确是介休之福。我自己是介休人,在那生活了20多年,但这几年我到介休的新城以后,找不到方向,都是新修的,修得很气派。我觉得这个成就是很显然的。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是面临巨大挑战的。如何走这条路,实际上没有完美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用西方的经验。中国人确实是比较容易自卑,在一个13亿人口的地方,要创造一个新的东西是很难的。现在我们上海一个区就有上百万人口,管理这样的城市和国家,没有一条完美的道路,但是相比之下西方人走得比较早,我们比较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非常急。因此,一些人完全被打败了自信心,就觉得中国太差了。另外一些想建的人就比较着急,就觉得我们差距很大。我个人觉得历来没有一条完美道路。什么是完美的,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路线?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国外根本不了解的,打破脑袋都想不到的问题,他们能给我们参照吗?我们的历史文化他们懂吗?所以我非常支持像王怀民市长这样的有抱负的官员和大胆的行为。失败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完美道路,哪个说西方的建设是完美的,是没有挫折的?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中国人拿木头做房子,西方人很讲究,用石头造房子。听上去西方人很讲究,中国人图便宜。这是一种不理解,当时西方人也是用木头造房子的,但是连年遭遇大火,没有办法才改用石头造房子。他们也是经过那样的道路然后

再慢慢改过来的。当然西方人的城市建设我们是需要学习的,他们的社会市民,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城市建设当中,每个人都会出钱。就像我们上次在介休开会说到了的,比如以前上海外滩的租界,我们说租界侵犯我们的权利,但当地的住户会自发联合起来建立委员会,自己出钱搞这个区的建设。中国人一看这不是侵犯我们的权利吗?你怎么侵占我的道路,这又不是你的国家。但是这个工程委员会就是首先铺路灯、铺电线,他们自己出钱来建设租界。租界可以说是现在上海最好的地方,当时是这些移民,外来的殖民者他们来建设,按照他们西方的模式给移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中国人说你们侵犯我们的主权了,但是最后南市区被推翻也是仿照租界进行重新建设的。他们有这个经验,他们的社会是为民的,市民为了自己生活得舒适自己出钱,自己组织委员会来搞这一套。但我们中国没有这些,我们很多的千年古村连一个完整、硬化的道路都没有,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实现城市建设,这是前所未有的宏伟蓝图,是为了中国人的福祉,当然其中肯定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当然在这里我想要说一些关于介休我的想法。第一,王怀民市长也说过,营造山水环境这一点希望领导可以注意。比如最早我们介休的坞城店是一个湖畔之城,它北部是一个大型的沼泽地,所以原来我们介休的山水环境是不错的,洪山的水直接流到我们的汾河,它们构成了比较好的水流系统。当然这个水流系统也有危险,我们团队的李嘎研究过,因为现在我们的城是在最低处,那里发洪水的概率很大,山洪一冲下来就会冲到城里面。一般说水是一个城市的灵性所在,现在我们的城市就没有环流的水,以前为了发展一般都是把水道填平,有的人以此说我们的环境变了。但是没有水道,没有泄洪渠和疏浚河道,光有硬化路面,这对一个城市来讲是很危险的。水道的循环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要建造的就是一個山水之城。从绵山上下来的水应该要与汾河有比较好的联合。我们现在汾河上面还有10座以上的桥,基本都属于功能桥而不是景观桥,都是钢筋水泥,没有好看的,完全是为了运煤。我非常赞赏介休要投资整治这33千米河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保护。下一步我要重点调查的就是山水环境,这些河道是如何联合起来的。坞城店在六七十年代水还是很多的,现在水很少了,都建房子了。

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营造城市的美。我们以前觉得,恐怕介休人也是这样,觉得美就是花香。但是我们看西方人的城市建设,城市的美、城市

景观,它是一种文化财富,是靠多年的积累而来的。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城市过了几百年就衰落了,它不像西方,西方有一种 refurbishment 制度,也就是重修的制度。他们的一座塔,可能有 1000 年的历史,但他们有制度 30 年至 50 年就要重新整修,所以几百年的塔今天你去看还是非常新的。外国人的脑袋比较死,他一旦定了绝对不会改。所以我在牛津的时候,那个博德利图书馆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看还是非常结实,它过一段时间就要整个进行整修,内部都是现代化建筑,外部整修得非常好。所以我一直不理解我们的“修旧如旧”,他们就是很新的,就有这样一个阶段时间必须进行整修的制度。所以关于城市美观、景观建筑,现在网上也在说,西方人每家的窗口都有画,装饰了非常多的花窗,为的就是别人赏心悦目。我们常说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其实不好面子,西方人才好面子、好体面,注意你的房子好不好看。所以要提倡每家每户为城市的建设出力,花花草草并不是假的东西、浪费的东西,城市的美观是一种财富,大家看得很开心,你的眼睛在吃景色,大家都是好“色”之徒。应该把每个人住的环境搞到最美,这是一种文化财富。所以这方面希望我们的领导可以重视起来。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

五、文化遗产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财富

王怀民:刚才听了四位教授的发言,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你们不愧是大家风范。来到四川大学看不见大楼,其实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四位教授所述突破了人类学领域,和我们的生活家园、城市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从研究范围来讲超过了学术范畴。我们做任何事情,知识和实践、知识和现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不管是搞什么研究的都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

从我的角度来讲,几位教授鼓励我,其实有些东西也很困惑,徐新建教授讲政府主导的人民为主体这个关系比较难把握,有些事情急不得,有些事情又等不得,等条件完全成熟了再做,保证不了我们工作进程。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总得有第一个人做。美国一位总统曾讲,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不去做,谁来做?做这件事情从初期来讲,一定是由政府强势来推进,做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是基本做完了,机制就要转变到政府和民营共同做,或者民营为主,政府为辅;或者政府为主,民营为辅的机制上来。要解决让他们利用这个平台有收益,这方面我和几位民营企业负责人也做过一些探讨,鼓励他们转型做一些文化和旅游的事情,但是他们有顾虑,我也有些

不放心,担心他们不完全按政府的规划意图来做,他们要考虑商业利益,考虑获利空间,造成一些遗憾。但是肯定有一天机制要变,不能一直由政府管到底。

在政府和市场这个关系上,中央已经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很多资源靠市场来配置,政府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非常希望民间的有识之士来做这件事情,政府和社会各尽其责,但是两者有时候很难取得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是强势政府,但有些事情政府不去做,社会做不成,真正的做文化的事情还是要政府强烈地推进,才能落地有声、善做善成。

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问题,现在第一步主要是搞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分布在乡村的文化遗产也多。像北辛武的琉璃牌坊就非常好,现在政府还不能全覆盖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要吸引民间有识之士来投资,但有这样眼光的人士不多,像山西的一些煤老板在黄金十年挖煤就是挖金子,干了煤矿干其他挣钱太慢,所以转型首先是人的思想转变,这个看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政府这样做,给基层起了一个以上带下的榜样作用,一些村里有文化遗产,有保护愿望的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村里筹措一些资金,把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不要让它消失掉。

我去过一些国家,像德国 35 万平方千米,8000 万人口,美丽如画,能让人感到这个民族了不起,把自己国家建设得没有城乡差别,一眼望去全部是绿色。德国制造,为什么他们能做到那样?就是太认真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认真一些,做到精益求精?我们有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史,特别是 30 多年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城市基础设施还落后,安介生教授讲到城市的下水道,这是体现一个城市真正的良心,真正的功能在地下,现在看到城市高楼林立,一片繁华景象,但夏天下了暴雨的时候,排不了水,城市闹了涝灾。我们搞城市建设、城市文化,对地方政府的挑战很大,首先需要去做,还愿意继续做,能做成,并且觉得还能做得更好。5 年来,我们第一期的工程接近完成,相信第二期比第一期能做到更好。做到真正意义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现在觉得城市很好,生活幸福。我也常常逢年过节慰问一些低收入贫困家庭,看了以后,觉得我这个市长当得不称职,有些生活在城区的比农民还要苦,收入很低,特别是家里有残疾人的,因病返贫,因残返贫。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家庭收入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状况,财政收入主要是看对国家和政府贡献,要改变这种差别是政府长期要努力的。

这几年在文化建设包括在座教授们的呼吁,特别是像冯骥才先生那样,长期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在保护古村落上,而不是在老城区上,我们这几年有了文化觉悟,有一批在基层默默无闻做事的干部。我为什么愿意做还能做成这件事情,主要受我的老领导耿彦波同志的影响,他主政榆次区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常家大院保护。常家大院修复完成了4万平方米的民宅和8万平方米的后花园,它是耿彦波同志在完成灵石王家大院以后修复的第二个大院,肯定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常家归来不看院。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特点,如果能找到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就能找到这个城市的灵魂,找到了根。文化这种东西,一旦遭到破坏不可复制,不可再生,我是从实践中体会出来的,文化遗产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人们对高楼大厦的感觉,是个钢筋水泥森林的结合体,只要有钱,谁都能干。所以,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文化发展的事情,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实实在在的官员,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县官。平遥县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下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县级官员确实是干事业的一个平台,大的官顾及不了,小的官不做事,县长这个官不大不小,是个能做事的岗位,所以说“郡县制、天下安”是有道理的。

关于文化遗产的“活化”的问题,介休的古戏台多,后土庙有三联戏台,叫好戏连台,我们要开阔思路,把这些资源都利用起来。四位教授说了很重要的意见,我们把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又是城市发展的不可缺少因素,怎么样把城市建设得更美好,把山水、景观和文化与住宅统一起来,就是我们所讲的宜居城市。不仅做传统文化,也在做新旧结合,传统和现代结合。2010年创建国家园林城市,3年间栽了500万棵大树,建了若干公园,人均绿化面积10.8平方米,建城区绿化覆盖率37.6%。2012年5月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用了3年的时间,2015年成为全国72个国家卫生城市之一,新的旧的一起做,都是涉及城市民生的工程,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不管有多少事情,文化建设是这个地方的灵魂。

在一次城乡规划会上我讲要建设“五美介休”,

即“生态之美、和谐之美、文化之美、产业之美、发展之美”,这五美的标准,是以老百姓脸庞绽放的笑容作为标准。管理好一个城市有它的优势,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可以调动很多资源,也受法治水平、文明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毛泽东主席讲过,中国的问题重在教育农民;彭兆荣教授讲到,中华文明要出问题就出在农民身上。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过去的知县是“教化民风”,教育民众做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还有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我们也意识到了,周大鸣教授讲的有些老百姓把建筑物的东西拆下来卖了,它不管你遗产不遗产,有收入就行,这些年有文化遗产的村落流失的砖雕、木雕、石雕很严重,是老百姓追求眼前利益,把几百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卖了,还有的把建筑物拆掉,垒了猪圈。

今天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见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提升到一个城市思维上来,这个话题分量很重,其实做这件事情,一个周期循环下来,就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宜居的、有个性的、有乡愁的城市,就是为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感到赏心悦目,心情愉悦。今天的收获,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万里长城的第一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结 语

徐新建:黄土文明与地方发展是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团队针对黄土文明的人类学研究开展的系列议题之一。我们的议题以山西介休的实践为例,关注文化遗产的地方经验。各位通过对话方式,围绕“遗产保护的现实背景”“地方规划的权力均衡”以及“政府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及功能”等方面做了很好的阐述,并就介休个案的范例意义进行了问答和讨论,其中既有充分肯定,也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还有一个顺带的成果,是通过学者与政府领导的对话达成了新的决议,为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介休政府的课题合作打了新的基础。就像与会教授概括的那样,我们将从第一阶段的“文化遗产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建设城市之美”。这是对我们整个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本课题所探讨目标的设定。这就是说我们的发言不仅仅是空谈,还为了在实践中贡献学术的力量。谢谢大家!